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107 期

107

王新奎：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美贸易关系
刘中民：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八年五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昭' (Hu Xizhao), which is the nam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Council.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最近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即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两期沙龙：第 138 期沙龙——王新奎先生作的题为“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美贸易关系”的演讲，第 139 期沙龙——刘中民先生作的题为“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的演讲。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先生在“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美贸易关系”演讲中提出，对于任何处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第一，要以平常心处理目前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求一战决胜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采取过激的反制措施，避免授人以柄；适度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避免使 WTO 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争辩中国是否是“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国家的论坛。第二，要把 19 大报告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6 条重大举措放到经济全球化处于重大转折期的大背景中去落实，以切实增强我国在应对中美经贸关系战略调整和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的“软实力”。第三，要克服在过去 20 年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对外开放

的思维定势，要从创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长远视角来设计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特别是，对我国在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经济时代应采取何种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因为这才是决定中美“贸易战”最终胜负的关键所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中民先生在“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演讲中认为，对于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态势与前景，第一，围绕叙问题的战略博弈进入混沌期，突出表现在美俄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态势，双方对叙政权问题分歧严重，但在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反恐问题上又保持合作。第二，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斗争进入了复杂相持期，政治解决成为主要方向，但围绕巴沙尔政权去留和恐怖组织界定等问题的分歧严重。第三，围绕叙利亚问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支持叙政府力量的方向发展，但两个阵营都在总体上都呈内部分化复杂化的态势。第四，直接的军事较量有所下降，但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低烈度冲突将长期化，如近期无人机对俄军事基地的轰炸，以色列对叙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对阿夫林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动的军事打击等。第五，国内因素对各大外部力量的叙利亚政策的掣肘加大，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等都是如

此。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叙利亚危机或将进入政治解决艰难和低烈度冲突并存的僵持期。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目 录

王新奎：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美贸易关系..... 1

刘中民：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 30

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美贸易关系

王新奎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演讲即将开始，今天演讲的主题与中美经贸关系有关，这也是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上个月大家关心的是美朝会谈，当时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为我们演讲。这次，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王新奎教授。王新奎教授的经历很丰富，下过农场，做过中学老师，打倒四人帮后考进华师大学历史系学习，然后拿到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硕士学位。他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从老师做到系副主任，一直到院长。所以王新奎教授对外贸这方面很熟悉。他还担任过政府一系列的重要职务，担任过上海工商联会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他刚好今天交接，我们也刚好在这个时机请他来演讲。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新奎教授给我们做演讲。

王新奎（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好！乔依德邀请我来讲中美贸易关系，我觉得中美贸易战是否打得起来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是我和王战创立的，后来王战中途去市委当了主任，就剩我一个人了，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 18 年。从 2004 年开始，我们中心主要是为中央的双边、多边谈判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工作一直做到现在。我们有一

个大概的工作流程，就是监控规则变化对贸易流量、投资流量的影响，然后再从贸易流量和投资流量的变化去看产业的变化，用这样一个技术系统去支撑中央参与的各种各样的谈判，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 14 年。中心虽然都是硕士研究生，但他们也都是我们贸易谈判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因为中心的很多工具是单机版的，在谈判现场可以用，所以在一线参与了很多重大谈判和决策。我今天就想根据我的经验，先回顾一下我们研究中美关系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从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到 2005 年，中国有四年处于过渡期，这个是中美的蜜月期。2005 年以后就中美开始有摩擦，并且摩擦越来越多。我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特别关注是从 2012 年开始的，当时有件重大事情，就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BIT 谈判进行到 2008 年就暂停了，因为 2008 年以前是按照美国 2004 年的范本来谈判的，美国后来要求修改这个范本，2012 年美国通过了 2012 年 BIT 谈判范本。这个范本公布以后，中美 BIT 谈判就正式重新启动，那个时候是由李成钢负责的，当时他还不是商务部部长助理，还是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我们中心也加入到谈判过程当中，特别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管外贸和金融的是王岐山副总理，他仔细看了 2012 年的范本和 2004 年的范本，发现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候 TPP 谈判、TTIP 谈判和 TISA 谈判几乎是同时启动，这些谈判基本上是把中国排除在外了。所以 2012 年根据王岐山副总理的指示，当时商务部党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全球化形势的新变化，按王岐山副总理的话说就是“你们看看这世界变了”。

那一年我也去参加了党组扩大会议，还在上面做了演

讲。回来对俞正声书记汇报，俞书记非常重视。后来由韩正市长负责，成立了一个上海市政府和商务部共建的虚拟研究基地，叫全球贸易投资咨询研究中心，实际上就是一块铜牌挂在我们 WTO 事务咨询中心门口，还有一块铜牌是跟工信部合作的。我们和商务部共同组建团队，上海方面是我负责，商务部方面是由张向晨负责， he 现在是驻 WTO 大使，我们开始重点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进行研究，到现在为止连续出了三份报告，都是国家重点课题，这个我就不讲了。

所以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并不是像有的同志说的那样，是因为选了特朗普这样一个人就突然爆发，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了。我记得 2013 年李克强总理到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开了一个座谈会。那时候我们刚刚完成第一个课题研究，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这样一个研究项目。按照韩正市长的要求，我在会上为李总理做了八分钟的汇报，当然预先提供了一份讲稿给他，大概是六张纸。当时其他人都是企业界人士，咨询研究部门就只有我一个人。李总理看来是有备而来的，他讲了三层意思：第一，这个坎看来是绕不过去的；第二，中国的重大改革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完成的，必须以开放倒逼改革；第三，如果中国不能适应这个形势，中国就面临被排斥。所以他建议设立上海自贸区，他加了试验两个字，因为面对中美重大的战略调整，应该有个地方做压力测试平台。为什么一开始就搞负面清单呢？因为那个时候中美 BIT 谈判核心问题是负面清单问题。

所以从 2012 年开始到现在 6 年时间，我们和复旦、交大、社科院、情报所、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有一个很稳定的团队，一直在跟踪、监控、预警全球形势的变化。第二期课题完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下的外资政策创新”，最近5月份马上就要出一个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新战略”，这是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要求来做的。

为什么我要讲这么远？因为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心最基本的研究成果，现在做形势判断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来推断。我想跟大家汇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趋势。我们和商务部合作，经过六年的研究，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我们用三句话来归纳总结。

第一句话就叫做全球经济“再平衡”。最近中美贸易战一开始，一下子冒出来无数个研究中美贸易的专家，而且从不同的角度，从分析特朗普的性格、爱好开始，一直到文明的冲突，有的很有道理，有的也是想得太多。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要讲的这么复杂。我给大家看两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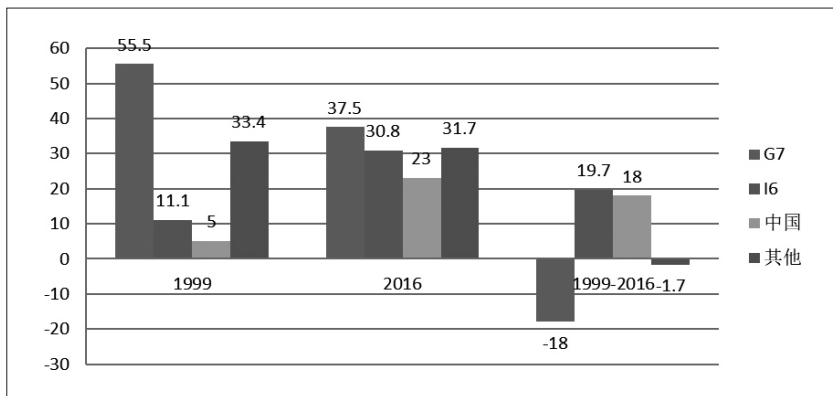


图 1：G7、I6、中国与其他国家 1999-2016 年工业份额变化

这是第一组统计数据。图 1 是 1999 年到 2016 年的 G7、I6、中国与其他国家 1999-2016 年工业份额变化情况。1999

到 2016 年这 17 年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看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家在全球工业当中所占的比重。这里有三类国家，一类国家叫 G7（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一类国家叫 I6（中国、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波兰这六个新兴工业国家），选取的标准是，这近二十年当中在全球经济中，特别是在工业中占全球比重上升的就是这六个国家。近二十年里，发达国家 G7 从原来 1999 年的 55.5% 下降到 2016 年的 37.5%，下降了 18%；I6 这个六个国家从 11.1% 上升到 30.8%，上升了 19.7%。在 I6 这个六个国家中，中国从 5% 上升到 23%，就中国这一个国家上升了 18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在这 17 年当中所上升的比率差不多是 G7 下降的比率。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重视，就是除了 G7 和 I6 以外的其它所有国家，他们在全世界工业所占的比重下降了 1.7%，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之外，包括俄罗斯、巴西、南非，这些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很有希望成为工业化国家或者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但是在这近 20 年中变成了初级产品国家，这个变化要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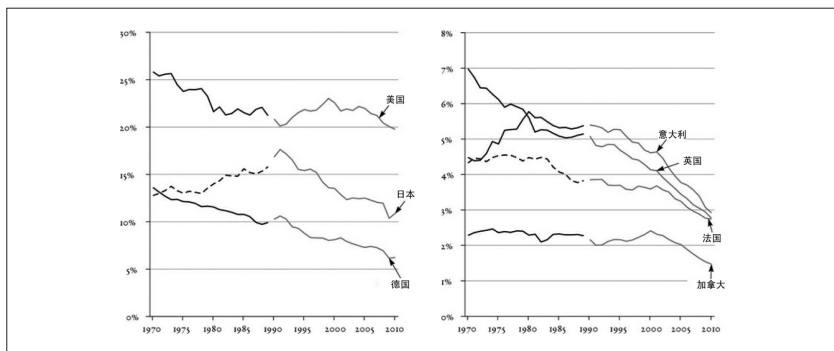


图 2：G7 占世界制造业份额（1970-2010）

第二个是制造业的份额变化（见图 2）。G7 在全球制造业当中的总体趋势是从 70 年代就开始下降。日本从 1970 年代到 1990 年是上升的，有很多人拿这个阶段把我们和日本对比。但是 1990 年以后所有发达国家的比重都是下降的。而且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下降是最厉害的。美国其实在整个 90 年代的比重是稳定的，而且 2000 年之前还是上升的，但是 2000 年以后在全球制造业上的比重开始下降了，特别是 2001 年急剧下降。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当初研究说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多少多少，但是看了这数字你会发现，中国同时也是处在一个火药桶上，问题都是两面的。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曾经跟我讲：“我在 WTO 谈判的时候，我的地位就相当于伊朗，所有的国家都反对我们，把我们称为躲在蚂蚁后面的大象”。所以我们在参与 APEC 环境产品谈判、信息技术协定（ITA）谈判（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谈判）、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这一次我们在俄罗斯海参崴参与 APEC 环境产品谈判，中国代表主张：“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品要削减成零关税，发达国家要给我们援助。”过去 WTO 都是这么谈的。结果提出反对的都是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就说：“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次谈判的范围。”发展中国家说：“这怎么行？你们中国拿了援助哪里还有我们的份？”就这样拖到现在，每次谈判都无功而返。我们的出价水平大大低于东盟，这样一种情况让我们压力非常大。其实我们自己的很清楚，就是自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制造业

占这么大的份额，其中一半是加工贸易，我们的国内市场如果不保护的话，那就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这样了。

年份	总额	德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4 国合计
2008	8162	5.3	9.1	1.6	32.8	48.8
2009	5036	6.0	8.9	2.1	45.1	62.1
2010	6354	5.4	9.5	1.6	43.0	59.5
2011	7254	6.8	8.7	1.8	40.7	58.0
2012	7304	8.3	10.5	2.3	43.1	64.2
2013	6895	9.7	10.6	3.0	46.2	69.5
2014	7352	10.2	9.2	3.4	46.9	69.7
2015	7457	10.0	9.3	3.8	49.2	72.3
2016	7355	8.8	9.4	3.7	47.2	69.2
2017	7962	8.1	8.6	2.9	47.1	66.7

图 3：美国与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贸易平衡
(2008-2017, %)

第二组统计数字是贸易平衡。图 3 是 2008 年到 2017 年美国与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的贸易平衡，我这里讲的是货物贸易。从 2008 年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基本上是在 7-8 千亿之间，今年又要到 8 千亿了，去年是 7962 亿，是按照美国海关统计的原产地计算的。我们就看去年 2017 年的数据，德国大概占 8.1%，日本占 8.6%，韩国占 2.9%，中国占 47.1%，也就是说美国 7962 亿的贸易逆差当中，一半是对中国的逆差，德国、日本、韩国、中国这四个国家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 66.7%。2017 年的情况有几个数字很有意思，2017 年美国货物贸易总额增加了 600 多亿美元，日本、德国和韩国所占的比重都下降了，德国从 8.8% 下降到 8.1%，日本从 9.4% 下降到 8.6%，韩国从 3.7% 下降到 2.9%，中国从 47.2% 下降到 47.1%，基本没有下降。这些数字列出来，

不是经济学家讲点那些储蓄率、全球价值链、一架飞机换我多少件衬衫等理论能解决问题的，统计数据到这个程度就是个政治问题了。如果这关过不了，接下去就是打仗，历史就是这样。我 90 年代到美国去的时候，看美国的“铁锈地带”已经非常可怕了，你现在再去看看，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 WTO 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和我也算是好朋友，为了和他搞好关系，商务部授意我们在世博会的时候为他办了一个升旗仪式，商务部还专门派了高福成过来陪他。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跟我说：“你一个有几千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国家，还在到处讲你受到不公平待遇，谁会相信？要是你受到公正待遇，又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你想过吗？”我马上跟商务部汇报这个问题，他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这次北京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邀请了拉米，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代表官方发言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享受差别关税待遇。”拉米马上站起来发言说：“不对，你们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他其实对我们中国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这是个基本面的问题。

关于再平衡问题，我们中心之前专门向上层提交了一个报告。我们提了两条建议，一条要重视中美贸易逆差，第二要接受公平贸易概念。最后中央都接受了，就是基于这个判断。这个数字摆在这里，你可以讲出一百个道理来修正这个数字，说没有 7962 亿只有 7862 亿，那也没用。这是第一个再平衡问题。

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

第一，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失衡”后的“再平衡”，不能直观地做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

情绪化判断。所以你看我们中央现在很少提“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我们讲“失衡”。当然民间现在怎么讲，又是另外一事情。当然各有各的想法，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汪洋副总理说解决这个问题要慢慢来，但大家都承认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第二，造成前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失衡的原因既有行业层面的技术原因（制造业分层式生产、任务贸易、全球供应链区域和地区的集聚布局），也有工业化知识全球化本身特征的原因，因此具有必然性。全球供应链区域和地区的集聚布局，这个没办法，有的地方就是纳入不到全球供应链里面去，比如中东地区天天打仗，怎么纳入呢？还有一个是制度的特征，我们中国是得益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大致是和当初的全球化结合的，许多国家建立不起来，无法纳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去。因此不平衡具有必然性。但是现在这个“不平衡”带来很严重的问题，非但在全球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包括中国、欧盟在内。如果用计算机模拟出来，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点和基本上处在全球化之外的点，反应在计算机的图上，那个颜色是非常清楚的。中国“西部大开发”讲了这么多年，现在改变也就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郑州，因为富士康过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成渝地区，因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一批外资企业过去了，特别是汽车。其它地区折腾了这么多年，在全球化系数上基本没有变化，因为不具备运输条件。很多被全球化边缘的地区，甚至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都有关系。

第三，2005年以后，由于G7向中国制造业的集中转移，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对中、日、韩、德，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中美经贸关系

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焦点。G7下降了18个百分点，中国上升了18个百分点，肯定是焦点。

所以关于“再平衡”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下一个问题全球规则的时候，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如果“再平衡”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规则问题就都谈不下去了。我们现和中日韩谈判都是走个过场，大家都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办，谁都不敢作出承诺，怕将来压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所以美国一对中国启动232措施，第一反应就是日本对中国和韩国的钢铁启动反倾销，日本这个国家好多年不搞反倾销了，这次是因为压力大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就一笔带过了，创新知识全球化方兴未艾。我们是从科学家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初监控了几大谈判，TPP谈判、TTIP谈判、TISA服务业谈判，看有哪些谈判的条款是过去从来没见过过的，就拿出来研究，结果发现都和创新知识全球化有关系。301调查的知识产权还不是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商业数据的自由流动、计算机位置的限制、隐私的保护、电子商务中数字产品的永久零关税等，这些条款是国际上从来没有的，是货物贸易从来没有的，其复杂程度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从这个角度看，原来的以货物和服务自由化为特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本世纪第20年开始全面进入创新资产全球化的时代，一些规则都要改变。

我最近组织了一批人专门去张江高科技园区专门调研生物制药行业，从生物科学开始到制药，从药的研发、制药、临床、一直到医疗，发现完全是全球化的。就连写一篇文章都要牵扯到30多个作者、8个国家的实验室，关起门来单独搞一个实验室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微量的科学物质运

来运去，自己实验室小白鼠的微量分泌物，运到美国去，美国小白鼠的分泌物运过来，马上就对我们的海关的卫生检验带来无法应付的挑战。我们现在卫生检验是按照检验动物的标准来检验的，0.2 微克的小白鼠分泌物需要保存在零下 70 度，放在海关里面，需要开后门去送干冰，没有干冰就坏掉了。小白鼠前一个阶段大批饿死、冻死，现在这个问题经过努力总算解决了，所以它也是全球化的。中国科技部下面有个部门叫中国人类遗传物质安全管理办公室，它根本不理解这个过程。

所以现在新的趋势就是创新知识的全球化，这里面也有三个结论：

第一，由信息技术重大突破所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引发前所未有的应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浪潮，在创新领域正在大量出现类似制造业领域全球价值链的创新全球化模式。

第二，数据正在逐步替代商品和资本成为创新全球化的载体，大量的创新是发生在数据领域，不像过去是发生在资本和商品上面。这样一来，政府在边境和边境内的监管如何适应创新全球化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贸大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第三，制造与服务融合，特别是智能制造与数字服务融合，使无形的知识价值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这种变化已经越出传统经济统计理论、统计技术和统计方法力所能及的范围。为此，政府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现在的产业政策，评估下来很多产业政策都是无效的，因为产业政策都是按照大产业来做的，实际上真正的技术创新和真正

的创新是发生在一个价值链当中的某一个增值环节，这个是产业政策覆盖不了的。

这几天我们就很头疼，美国打我们是 8 位税制号，我们自己的海关统计最长是 6 位税制号。一个 6 位税制号可以对应很多个 8 位税制号，打来打去不知道打在它什么地方。其实美国还有 12 位的税制号，具体到 12 位税制号就是个螺丝钉。所以现在选择越来越困难，风险也越来越大，小小的一个政策性的错误，可能那个行业就会被弄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受到的教训太多了。

举个例子，当初欧盟对我们光伏反倾销，当时我们也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欧盟向我们出口最多的是晶硅，我们报复欧盟，禁止进口晶硅。我们大量向欧盟出口的是工业硅，欧洲将工业硅制成晶硅卖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把它制成硅片、制成集成电路，组装后再买给欧盟，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报复欧盟打晶硅反倾销，晶硅的价格一下子就涨上去，被打反倾销的那个组装环节的企业最反对。最后说要报复欧盟的葡萄酒，结果也不行，葡萄酒企业反对，后来才发现我们国内的张裕葡萄酒、长城葡萄酒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原酒来分装的，不是自己制造的。所以现在是全球价值链，单是以海关 6 位税制号来打，风险是很大的。

我们这次第一轮报复的时候，选来选去，选了个高粱。第二轮的报复，针对 232 措施的 30 亿报复清单，基本上是花生、坚果等，最莫名其妙的是有草莓。经过海关一查，从来没有进口过草莓，就一次是 40 万美元，大概两个集装箱。后来再查下去，发现是刘向东（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书记、厅长，2015 年涉嫌受贿罪，被依法逮捕）跟习近平主席去美国的时候，为了表态他买了两箱草莓回来，就这么来

的。所以打仗就是这么打的，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现在大家都讲大豆，大豆我们早就想打它了。一打大豆，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养殖牛羊猪全部靠豆粉的，一打的话豆粉价格就会涨，那么我们日常吃的肉类就都要涨价，所以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创新知识全球化的情况下，政府的决策越来越困难，风险也越来越大。

第三个要讲的问题是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国家和商务部最关心的。重构大概有几个趋势性问题。

第一，在要求调整全球生产和贸易布局的政治和市场力量的压力下，近 10 年来，处于经济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之间分歧巨大。WTO 多边贸易体制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作为 WTO 体制升级模板的 TPP 谈判也已受到重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将在主要经济贸易大国的双边博弈过程中逐步实现，这一过程无疑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一点对外是不讲的，因为对我们有利。WTO 的谈判是 164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不能有一张反对票，然后才能通过。这个体制为什么还能通过呢，因为当初是有人请客的。比如今天 G7 来请客吃饭，在里面谈下来要减多少税，谈好以后分两档，一档是发展中国家，按照一个公式，我减 20 你只要减 10%，总体水平是我牺牲最大；还有低收入国家就不要谈判了，一同享受。这样一来就都通过了，因为有人买单。到了多哈议程，一个原因是走进来一个中国大妈，胃口大得不了的，美国人请不起了。而且多哈议程谈了 20 多年，议题已经陈旧不堪，到现在还是谈农产品，从 1994 年

谈到现在 24 年了，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件事情。本来 WTO 应该是像全国人大一样制定规则的，现在 WTO 成为了人民法院，在里面打官司，而且这个法院也没有什么执行力，判下来有结果也没有执行的，大家都是对我有利就执行，对我没利就不执行。一个官司打四年，花掉的钱不算，而且四年下来也没有用。本来奥巴马对 TPP 是这样想的：一百个人吃饭我不请了，我请十几个小兄弟到五星级宾馆好好地吃顿饭。结果特朗普上台以后说：我也不请，我现在是 AA 制，一对一。

第二，当前构建能适应创新全球化的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条件尚未成熟，与此相关的实践、知识和理论还刚刚进入储备阶段。特别是创新全球化力量已经逐步脱离传统边境措施管理范畴，这使得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在知识与经验上面临颠覆性的挑战。从理论到知识，各个国家都是非常缺乏的，而且很难取得一致进展。比如说这次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WTO 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表面上是由澳大利亚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美国在后面支持的，最后他们 70 个国家（如果欧盟算一个国家的话，那就是 44 个国家）准备在这个月启动电子商务多边协议谈判。我们中国最后没参加，本来我们觉得应该参加的，为什么不参加？因为这次谈判涉及到我们的防火墙问题，涉及到我们刚刚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规定只要是在中国从事数字贸易的，所有服务器都要放在中国。这两条就不符合它的谈判原则，所以我们只好退出。这次 Facebook 出的问题就更麻烦了，接下来这个隐私问题，欧盟肯定抓住不放了。所以总的来说，这方面的实践、知识和理论才刚刚进入储备阶段。创新全球化力量已经逐步脱离传统边境措施管理范畴，这使得全

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在知识与经验上面临颠覆性的挑战。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高校里有什么专业能研究这个问题，这很缺乏。

第三，创新全球化对缓解经济全球化“再平衡”压力的作用目前还十分有限。在短期内，不可能像过去 30 年一样，再出现依靠诸如 WTO 那样的治理制度创新的“红利”来推动全球贸易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因此，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过程将会显得倍加艰难。这是我们的整体判断。

接下来想分析一下美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重大转折的战略及策略。老实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在这里搞实证研究，第一是信息不完善，信息得不到，特别是看着手机在那边研究，肯定是南辕北辙，基本上是没信息。第二是信息不正确，也不讲它是假新闻，至少都是些标题党，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是只研究官方文件，我们不研究其它东西，然后再观察它几个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量，来看看美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重大转折采取的是什么办法。

第一，有两句话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就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它本身，并不等于是反全球化，也不等于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不等号一定要写清楚，舆论上你可以这样讲，做标题党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在具体研究策略和战略的时候，不能给美国扣帽子说美国就是反全球化、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要是你这么说，那全球化你来弄，贸易全球化你来主持？所以你看最近这种话开始减少了，我们大旗也不扛了，因为扛不动。这一定要当心的，现在有的人说他们来扛，每年两三千的顺差要变成两三千亿的逆差，你行吗？你行你去扛，你扛不动的。

那么美国有几个基本策略呢？

第一个基本策略是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现在我们一般把它翻译为互惠原则。在《1930 年贸易法》当中就有关于“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的概念。公平贸易原则提出来以后，商务部紧急组织了法学家进行研究，我们中心也参与了。结果发现，WTO 里讲的非常清楚，WTO 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的贸易自由化，公平放在前面。自由贸易不是个法律概念，而是个学术概念，大学教授在那边讲自由贸易，WTO 的正式官方文件都是讲的贸易自由，就是政府对贸易在边境上的管理措施约束在议定的范围里面，原文就是这样的。所以从美国最近处理钢铁和铝制品的 232 调查的手法来看，它所谓“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主要是对盟友国家，美国的这个原则只适用于盟友。比如说，我们最近跟踪了美国的 NAFTA 谈判，跟踪了对欧盟的豁免条件谈判，跟踪了这次美韩自由贸易的重新修订，美国都是这个原则，过去美国请客买单，现在大家 AA 制，这都是对美国盟友来讲的。

第二个基本策略是基于主权的国家安全原则。特朗普政府的《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个我体会很深，在第一次中美 BIT 谈判的时候，我们提出经济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美国坚决不同意，说：“国家安全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国防，一个是健康，怎么能把经济也放到国家安全里去呢？”一直谈不下来，李成钢还为了这个问题召集了好几次会议来讨论到底接受不接受。现在反过来美国讲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所以美国把他的主权放在多边协议之上。从 1930 年开始武器库当中没用过的武器多得不得了，301 条款只是其

中一项，还有很多很多。而且这些东西都没有写到 WTO 的约束范围里，所以就算真的把美国告到 WTO 里去，也很难判。有一次日本因为 301 条款在 WTO 起诉美国，最后败诉了，因为 301 不属于这个 WTO 的边境范围。还有就是最近国家安全生产法案（我们叫 CFIUS 法案），基于主权的国家安全原则，主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者就是这两个国家。

从美国接下来去的发展来看，有两条线越来越清楚，基于对等原则的对盟友是可以讨价还价，可以让步的，我看美国最近和加拿大、墨西哥的 NAFTA 谈判有很多方面都让步了。比如说和加拿大的 232 谈判，美国就只有一条要求，就是加拿大现在大量从中国进口原铝，加工成半成品以后卖到美国去，现在要求提高原产地标准，就是把中国进口的铝锭加工成半成品来卖，不算是 NAFTA 范围，不享受零关税，把这个标准提高，加拿大现在答应了，因为不跟中国买跟其他国家也能买到。

第三个基本策略是保护和促进创新基础的原则。美国认为知识创新是美国核心竞争力所在，它在 2017 年国家安全生产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要保持在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护美国经济免受不公平获取知识产权的竞争者的损害。在这个报告中，美国新设一个名词——国家安全的创新基础（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301 调查是按照这条原则来启动的。

最后我想讲讲进入战略调整期的中美经贸关系。我认为观察中美经贸关系应该避免几个误区。

第一，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者”不是特朗普个人的竞选策略，是美国基本国策的重大转变，具有长期性

和连续性。现在有很多人寄希望于特朗普选举时不被选上，最好特朗普被诊断是个神经病，或者因为什么丑闻被弹劾。这些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们这样研究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政策，这个政策早在小布什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其实你看奥巴马从 TPP 谈判到 TISA 谈判整个就是这个策略，只不过做法不一样。所以这个误区要避免，网上随便他去怎么说。但是我们在负责任地做战略研究、给中央领导提供决策依据的时候，不能以这个作为一个依据。

第二，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在美国国内有一定的民意和政治基础。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一部分新兴国家间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这点也要非常重视的。因为我们这里新闻报道往往就是哪个教授怎么讲，哪个媒体怎么讲，比如说华盛顿邮报怎么讲，你再去一查发现是国内某个人给华盛顿邮报投的一篇稿子，登在第五版的一个角落里面，我查过好几次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们观察到最近美国白宫内的人员调整，几十年来在共和党内部甚至包括民众党那些对中国的极端派都聚集在里面了。你看他们没有受到国会的制约，也没有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建制派的反对，说明现在有这个需要把这批极端派集中起来对付中国。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密切观测，这是我们现在的观测重点。有一次我收到一份报上来的材料，说是特朗普上台一年，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无所成。我觉得原文好像不是这样的，再去查，原来是民主党的一份提案，说搞了一年对中国的措施一项都没落实，但是到我们这里标题一改就反过来了，经常是这样。所以这个不要存有希望，至少目前它有一定的民意和政治基础，不是一年两年了。最近我们有个青年团队，把他们的东西全部翻出来

重温了一遍，拍的那些录像、电影都看了好几遍，发现这批人在美国早就有市场了。

最近一个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一部分新兴国家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最具体事件就是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贸易谈判代表在布鲁塞尔那个会议，最后发了共同声明，没有指明中国，但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这次我们国家在 WTO 告美国 301 条款，美国在 WTO 告我们侵犯知识产权，结果欧盟和日本两个国家作为第三方跟进，说他们在中国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一部分新兴国家比如印度也跟进去了。

我特别关注大的跨国公司的态度变化。我们这里有个组织叫“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大概代表中国的 4 千多家美资企业。他和我关系很好，每年来我这儿好几次，每年报告还都先征求我的意见。今年的报告态度也完全改变，非常负面，美国商会就更不要讲了，还有美国服务贸易联盟干脆不和我们来往了。

第三，美国采取的纠正贸易不平衡的边境贸易政策，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定位为“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把中国排除在以创新知识全球化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进程之外。

这一点是我们这次给中央报告里最主要讲的，他的贸易是平衡不了的。美国的贸易逆差为什么要让中国一家独大？他可以给其它国家。给其他国家，他们都会说美国好；给中国，中国非但不说美国好，还要取代美国。所以美国施以手段，通过不断打所谓的贸易战，通过舆论宣传机器，逐步把中国定位为“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他还讲我们是非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管制的经济。比如最近 TISA 谈判中有

一章专门讲国家管制的经济，所以我们就不参加，我们一参加就变成国家管制的经济了。现在最新一种提法叫“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还有讲我们是“修正主义”、“重商主义”等等。现在特朗普出来表达得很清楚，他说：“当初让中国混入 WTO 是我们前几任总统最大的失策。现在把中国赶出去又不可能，那么怎么办呢？那我走了。”就像是有个俱乐部，中国进来的时候答应吸烟要到门口去，而且 15 年要戒烟。结果到了 15 年后发现中国非但烟还没戒掉，而且还公开地在俱乐部里面走来走去，吸烟一根接一根，那么要跟中国打官司。中国方面说：15 年到了，你还要把我赶出去，你还继续不让我吸烟，违背了承诺。美国实在没有办法：那你中国留在这里吧，我走了。当然，这只是美国人自己的看法。所以在日内瓦的这批人现在都已经在谈论没有美国的 WTO。

中美经贸战略碰撞可能有三种后果。

第一种后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达成全面妥协，以当年加入 WTO 的方式重归由西方主导并重构后的全球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由个人意愿决定的，这是两种体制的本质差别。我们中国要是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规则去做，基因里就没有这个基因，绝对不可能。我们曾经也努力想做到，做不到。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次 BIT 谈判，我们被他们拉去一个审订负面清单的委员会，然后要交给总理的。要开始和美国人谈判了，才下文件把凡是和外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它的全报上来，送到国务院法制办，报上来的有 22 万项。美国的负面清单就 37 项。我们最后下命令只能有 2000 项。多出来的按比例平摊，报多的多摊，报少的少摊，就砍成 2000 件，到了我们

手里。那时候 APEC，习近平主席要和奥巴马谈，习近平主席大概讲是 200 项，不能再多了，美国才 37 项。要把 2000 项砍到 200 项，砍不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的是荒唐得一塌糊涂的东西，有一项说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报的，说是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要经过审批，这个是要列入负面清单，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后来我们告诉他这和投资无关，要把这条去掉。

我们制定一部法律以后，各个部门衍生出几千个文件来，每一个文件基本精神都是一样的，上位法都是这个法律。同一水域，海洋局有海洋局的规定，水利部有水利部的规定，交通部有交通部的规定。过去我没做过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的。这个长江口，水利部提出来：水利部管的范围要到嵊泗。海洋局就提出来：海洋局的管理范围要到南京。道理都有的，因为长江口的淡水最远冲到嵊泗，涨潮的时候咸水最远冲到南京，长江口交汇点的这条线划不下来。这次机构改革终于并掉，不并掉两家永远是这样。码头里面的那片水，既不是水利部的，也不是海洋局的，是交通部的。所以同样一个法，它有三个文件，而且互相打架。这种情况要改变治理方式，完全像美国这样以 37 项负面清单来管理，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靠审批、靠行政来管理的，永远达不到美国的效果。也不一定美国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国情不一样，发展水平不一样，文化观念不一样，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种后果是，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中国作为特定经济制度的经济体被歧视性地对待。这种情况可能是美国最希望的，中国还是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体制，但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经济制度的经济

体歧视性地对待。这是有先例的，就是 ITO。当年美国主导想搞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当初是想吸纳苏联一起参加，有一章是非市场经济条款，把苏联作为一个特殊经济体来对待。后来因为冷战开始，苏联就没参加。结果这个条款后来就适用于东欧国家，东德、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都是按照非市场经济条款加入 GATT 的。我们国家加入的时候，按这个条款测试下来我们国家是全符合条件的，就一条不符合，就是价格改革没完成，所以才有 15 年的反倾销的比较价格，其它的什么进口承诺、出口配额现在都没有了。第二种后果我们肯定是不接受的，这样一来就是大大倒退回去了。我们进 WTO 终于争取到一个最惠国待遇，熬了 15 年终于可以解放，现在又要我们倒退回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三种后果是，经过较长时期的博弈，最终出现分别由中美各自主导的两个平行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就像当年以美国为首的 GATT 体系与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体系并存的格局。最有可能的是出现两种平行的但又互相交流的体系。在最初的时候，不是由一个多边体系构成的，而是由一系列互相交叉的多边和双边协定构成一个网络状态。举个例子，这次 TPP 美国不参加了，其实美国和其中 5 个国家是有自由贸易协定的，那么就覆盖在一起了。所以今后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和韩国谈判的时候，韩国就要求要加个投资章节，内容要完全按照 TPP 来写，那么这就是交叉了。这次在 ASEAN 谈判当中也是这样的，因为东盟是 TPP 的成员，要求一大部分内容要按照 TPP 标准来写，我们可能也会接受。到最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到底是按照美国的来写，还是按照中国来写，那要很多年的互相博弈了，

不是一场贸易战就能决一胜负的。我个人认为第三情况是非常合理的，就中美两国不要打，大家各自去发展，中国发展“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当中很多国家可能也是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或者是参加了 TPP 的，这种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

所以关于处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我认为有三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一，以平常心处理目前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求一战决胜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采取过激的反制措施，避免授人以柄。

我们要适度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但要避免使 WTO 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争辩中国是否是“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国家的论坛。我们以前上过当的。当年还是小布什政府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提前要求市场经济地位，小布什说，好啊，那我们开个听证会吧。就在华盛顿开听证会，我们想了想，还是派了两个处长过去听。结果变成控诉会了，一个个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中国怎么怎么不公平。后来马上收回来，不搞了。现在也有这个趋势。这次美国搞 301 调查以后，日本和欧盟马上跟进发表 301 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中国种种情况，而且还一家一家点名企业，这在全球影响非常大，还有很多例子没有拿出来。

我们的反制措施也不能那么不惜代价。昨天有个同事跟我讲，外面在传一个文件，说是已经下达了，如果中美一打贸易战，我们 25% 的报复关税，仅适用于外资企业，中资企业可以维持原来的关税水平。这个做法是不行的，这样一做马上就会授人以柄，但就是有人出这个主意。所以都要好好的算，不能乱打一通。我举个例子，今年统计数字出来

了，美国从我们国家进口大概五千亿，我们国家从美国进口一千三百亿。那么大家对打，结果我一千三百发子弹全打完了，他还有三千七百发，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最近分析了美国第一批 600 亿 1333 项的制裁清单，分析出来的结果你会很吃惊。我估计现在这个清单大量运用了人工智能，不然不会这么精确。90% 的产品从中国进口的比重只占了他总进口比重的不到 30%，意思就是美国打中国以后，美国换个地方也能买到这些产品，进口依存度不到 30%。所以如果真打起来以后，估计同样的产品美国大部分出口、进口会转到东欧国家去。有 85% 的产品是零关税，零关税加 25% 也不过是 25%。我们现在本来关税有的是 70%，再加上 25%，再乘以 17 的增值税，增值税还是不能抵扣的，这个关税不得了，结果等于自己打自己。美国有 5000 亿的产品范围可以挑选。现在如果美国这批 600 亿，中国也 600 亿，那么中国还余下 700 亿。美国再来 1000 亿，那么中国就拿不出来了。有人说，就是中美贸易不做了，我们也要奉陪到底，归零。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中央不会采取这个策略的，你们放心好了。因为中美到底是互相依存的，在全球价值链里面中美两国关系最密切，所以要有理有据。

第二，把 19 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六条重大举措，放到经济全球化处于重大转折期的大背景中去落实，以切实增强我国在应对中美经贸关系战略调整和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的“软实力”。六条重大举措中的第一条就是供给侧改革，最后一条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这六大措施接下去实施的时候，要以整个国际大背景作为背景来考虑，不能关起门来考虑。

我最近得了个虚名，就是“自贸区”好像是我提出来的，结果我到全国各地去开会，过几天又要到重庆去了。我们搞自贸试验区的这个思路，好像还是处在 90 年代中期对外开放高潮的时候，好像只要政策到位，全世界的外资会像潮水一样过来，如果不过来那是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到位。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的设计，一定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项重大举措放在国际大背景中去考虑。

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教训的。其实我们这次供给侧改革，没有考虑到钢铁的全球影响。如果第一次全球钢铁论坛，我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话语权的话，如果能够谈判在整个过程中怎么办，大概要负担多少，我们就主动了，就不会给美国一个理由去启动 232 调查。美国一启动 232 调查，第一个跟美国统一战线的就是欧盟。过去我们考虑供给侧改革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认为在供给侧改革当中能够增加出口，帮助我们消化部分产能，不知道这个问题会这么复杂。

第三，克服在过去 20 年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要从创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长远视角来设计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特别是对我国在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经济时代应采取何种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因为这才是决定中美“贸易战”最终胜负的关键所在。

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经济时代应采取何种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必须尽快做出决断，不能再等了，这个问题要现在作出决断了。这个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前些天我们中心派人到北京参加工信部这方面的会议，我没去，后来给我写报告就讲到了计算机的位置。腾讯就提出来：这个措

施是无意义的，规定将服务器放在中国领土内，除了增加企业成本之外，对安全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腾讯就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放在中国国内，容许境外的人来访问吗？容许境外访问的就更没安全可言，不容许人家访问的话放在这里干什么？如果是云计算，我服务器就放在这里，其他国家的客户来访问我们的云，那不还是一样，和计算机位置没有关系的。”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计算机位置当然很重要，但哪些需要计算机位置是要规定的，负面清单可以提出来。比如我在商务部讨论时提出来：“Apple Music 这个计算机一定要它放在内蒙古好像没有必要吧，只会增加我们的负担，原来用户一个月 10 元，现在一个月要 15 元，没有任何意义，它就是个音乐软件。”美国现在开始对像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征税了。它都是有背景的，也在不断地适应互联网信息革命时代的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所以这些问题现在要尽快做出决断，我们不能老躲在防火墙后面，关起门来称王，都是全球第一。阿里巴巴的包裹量、快递量，13 亿的人口肯定全球第一。这些是我们关于处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若干思考。

总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整个发展是处于一个上升期，而且这个势头谁都阻挡不了，但是这种上升期需要有和平发展的环境。这次我们传达习总书记在人大党员干部会议上面的讲话，我听得很清楚，他大部分时间讲的是国际形势。第一条就是全球国际形势的总基调还是和平发展。第二条是不确定性前所未有。第三条我记得很深，就是先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政策落到实处，有了这个软实力了，才能主导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才会有发言权。

不然的话，老是主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不行的。我是做观测研究的，所以这几点还是有把握的，谢谢各位。

乔依德：王教授讲的比较全面，我们还有点时间，大家看看提两个问题吧。

张明海：谢谢王教授精彩的演讲。刚才你讲到贸易战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定位为“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不可能通过一场贸易战解决问题。但是他们主要的目的会不会是扼制中国的制造业、高新技术等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的贸易算法，产业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底是多少都没有必要了。它主要拦一条线，就是吸引美国自己的制造业回归到美国去就可以了，有没有这样一个产业方面的思考？

王新奎：这个当然了，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我们吸引美国投资花了多少力气，给了多少优惠政策，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它现在税改就很清楚。最近余永定写的一篇文章，我建议大家去看看，写的很长，他分析了美国这次税改的结构，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吸引美国投资回去，这很清楚，但没有效果还不知道。当然靠优惠政策还不行，归根结底还要靠比较优势的变化。美国当然是要遏制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赵广彬：现在最担心的实际上是对美国出口的一些企业，对企业来说，最坏的贸易摩擦会是怎样的情况？企业应该怎么办？

王新奎：尽量避免打，真要打起来总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无可避免的。这几年实际上第一次打的是 201 条款，就是打洗衣机和冰箱。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大调整了，统计数据显示很多电冰箱工厂都倒闭了，都转移到海外去了。第

一打的是韩国，LG 就把生产转移到中国来了。接下去打中国，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冰箱工厂转移到泰国去了。这次不打反倾销，不打反补贴，他索性打保障措施，不管逃到什么地方一网打尽，给 4 年时间。那就没办法了，你只有适应。如果是打反倾销的话，就到其它国家去；如果打保障措施的话，就只能到他们那边去投资。这没办法的，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如果不到海外去，就靠国内优惠政策在那边活着，迟到也是要被淘汰的。所以有人说这次倒是一次机会，国内产业调整反而加快了，这就是总理讲的“开发倒逼改革”。如果再这样老想靠人民币贬值维持下去，人民币要贬到何年何月？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施宇澄：你刚刚讲的非常精彩，就是有关中美经贸战略碰撞的三种可能后果，你比较倾向于两个不同的贸易体系双轨共存、互相交错。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国内更开放市场，哪个代价更大？我们是更开放国内市场，有更多的产品从国外进口包括从美国进口，还是寄希望于建立双轨并行的贸易体系，哪个代价更大？

王新奎：这种可能性我们当然也不完全排除。但是现在有很大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互信，这个已经晚了。当年第一次访美的时候，还有这个可能性，现在我们做出的承诺，他基本上是不会再相信了。我们有时候也做的有点问题，我们答应过要进口牛肉的，然后弄了两家国有公司进口，进口了以后把价格提的奇高，说这个牛肉没人会吃的。其实就一点点牛肉，完全可以放它进来。最大的问题是重建互信，需要有一个阶段，你做一个动作，我做一個动作，建立起互信来。特朗普那边通过 Twitter 也在喊话，实际上他也希望有互信，不然老是在猜疑应该怎么办，什么都谈不

成。我们这次实际上是准备了菜单和礼品的，最后就是因为没有互信。但是我们现在也很难做出大动作，我们这个调整也非常艰难。如果说一下子就放开让他进来，我们又出现许多多余产能，那怎么办？我们希望这轮调整能尽快见效，那我们就可以放开一点，让他进来一点。

施宇澄：所以哪个代价更大？

王新奎：这个算不出的。政治家总是要考虑明天是不是有风险。

乔依德：今天时间不早了。再一次感谢王新奎教授精彩的演讲，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上海发展沙龙第 139 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的演讲马上开始了。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先生给我们讲一讲中东乱局，演讲的题目是“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最近我们基金会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因为我觉得 2018 年的朝核问题、中美经贸关系问题、叙利亚问题，都是地缘政治巨大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可能在历史上留下特别的痕迹。

刘中民教授最初是学政治教育的，1998 年以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他曾在河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担任教授。2007 年 9 月以来，他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从 2011 年开始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他发表了很多有关中东问题的文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对中东问题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上海来说是比较突出的。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中民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教授！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就中东形势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本来还

感到有些奇怪，基金会这样一个机构为什么对中东形势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全球宏观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而关心中东问题。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座的各位对中东的问题可能也不陌生，甚至可能很多人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今天我在这里对很多问题可能谈的不一定很深入，也不一定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说到叙利亚化武危机，我想起昨天在微信朋友圈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古罗马一个皇帝的話，“Everything we hear is an opinion, not a fact. Everything we see is a perspective, not the truth.”意思是说，我们听到的事情只是一种意见，并不代表是事实；我们看到的事情只是一种景象，也不代表着真实。在现在这个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对于我们面对的各种舆论，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听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我们看到的现象也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我就更难保证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能确实反映中东形势。中东形势这样乱，我也只能就我的理解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今天我想谈四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化武危机并不是我想详细讲解的内容，只不过是我们认识中东形势的一个由头，中东形势每每会有新的热点出现。我想介绍的第一个方面是这次化武危机的背景、实质和它的影响。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外部力量七年多来围绕叙利亚问题不断博弈的又一次突发事件。第二我想介绍一下外部力量博弈叙利亚的一个演变。第三想介绍一下域内外力量博弈叙利亚的诉求与政策，主要的域内外的力量包括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伊朗、以色列等等这样一些地区内外的力量。最后再谈一下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态势与前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叙利亚化武危机的背景、实质和它的影响。这几个背景，我觉得并不复杂。尽管要判断叙利亚化武危机的事实真相非常困难，但是判断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并不复杂。

第一个非常具体的背景，就是叙利亚的东古塔战事接近尾声。在很大程度上，这就代表着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对全国主要城市的收复和控制能力在继续增强，将使叙利亚战局的变化越来越向着有利于巴沙尔政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叙利亚危机博弈的各方，在曾经稍微有所淡化的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的分歧更加凸显。

第二个方面的背景，就是俄罗斯对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主导权不断强化。特朗普上台最初是想重启美俄关系，但是由于国内“通俄门”事件的影响，美俄关系重启不但没有实现，还向着不断恶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进入2017年以来，俄罗斯联合土耳其、伊朗建立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机制。这个机制成为了独立于西方主导的日内瓦机制之外的另外一个机制，在实现叙利亚战场停火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这种作用。再加上叙利亚国内的战事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节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不能再任由俄罗斯的主导权继续进一步发展。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近期的英俄之间的间谍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在这次问题上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特朗普在发动对叙利亚袭击的几天前还说要撤军的，但是为什么又突然杀个回马枪对叙利亚进行袭击？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俄对抗加剧欧俄对抗，乃至整个西方跟俄罗斯的冷战，这是这次事件的一个特殊背景。

第三个方面的背景，2017年“伊斯兰国”组织实体基

本被剿灭后，反恐共同利益的弱化使各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矛盾再度凸显。2017年“伊斯兰国”组织的实体基本上被消灭，尤其是2017年伊拉克的摩苏尔和叙利亚的拉卡相继被解放，作为实体的“伊斯兰国”基本上已经被剿灭，当然它的外溢和扩散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2015年、2016年曾经凝聚美俄合作的反恐共识在下降，那么争夺叙利亚主导权的问题就进一步凸显。

以上这些是关于背景，当然还可能有其他一些更深层次的背景。

怎么来看待当前叙利亚危机，或者说这次化武危机的实质？叙利亚危机从2011年的3月到目前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它并不是一场正规的局部战争，但是又冲突不断，目前来看仍然有进一步常态化的危险。我认为叙利亚危机的实质是：美俄及其扶植的代理人之间严重对抗，而双方又均无法主导叙利亚危机的现实，这是叙利亚危机常态化的根源所在，叙利亚因此成为美俄及其代理人恶斗的棋盘；叙利亚因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并不断上演强权横行、利益交换、生灵涂炭、道义沦丧的国际政治悲剧。

美俄互相博弈，但是美俄双方彼此又都掌握不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同时美国网罗了沙特等地区盟国，俄罗斯背后也有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这样一些地区势力，因此就使得美俄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都掌握不了主导权，然后这一系列的地区代理人相互之间展开争夺。从某种程度上说，叙利亚问题也昭示了国际政治的一种悲剧，就是国家弱小就只能被大国充当棋盘，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

我们可以来看看图1，最下面的第一个层次是大国层次美俄的博弈，中间第二个层次是沙特和伊朗的博弈，第三个

层次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反政府武装的博弈。实际上还有好多角色没有出现在这张图上，因此叙利亚问题不仅仅是大国博弈，地区大国乃至一些非政府“伊斯兰国”这种极端力量，各种国际政治角色都在叙利亚进行这样一种复杂的博弈，进而导致这场危机的长期化，到目前为止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图 1：叙利亚问题中的博弈关系

下面再简单说一下这次化武袭击对国际政治或者说全

球国际关系的影响。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暴露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在进一步加剧。2017年4月，美国也是用战斧导弹对叙利亚发动打击，也是借口化学武器问题，但是去年没有引起这么多的舆论关注。今年之所以引起这么多国内的舆论关注，与美国自己的炒作、与当下中美经贸战的特殊背景有关。但是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现在联合国已经快变成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摆设。也就是说战后所确立的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主要机制的集体安全机制，在叙利亚问题上被不断的撕裂，美俄两个大国彼此进行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相互否决的机制，难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上形成共识。这次西方轰炸叙利亚实际上再次体现了联合国权威不断弱化的趋势。

第二，国际体系的新冷战格局更趋固化。当然目前围绕国际体系是不是有新冷战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上有争论，但是近几年来，美俄、欧俄的对抗，包括中美之间，现在也有人认为正在滑向新冷战。尽管如今美俄之间的具有冷战色彩的博弈，以及未来中美之间具有冷战色彩的博弈，可能跟1991年以前真正意义上的冷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可能是在某些局部领域对峙的非常激烈，但是在某些领域还能有合作的存在。这些年来，包括俄罗斯的专家也认为美俄关系确实已经是一种新的冷战。如果再联系到2008年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2014年在乌克兰问题上收回克里米亚，再到2015年9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与西方的这种战略博弈，确实在不断的加剧。当然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冷战以后西方不断搞北约东扩，不断搞“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导致美俄博弈不断强化。这次我们看俄罗斯的表现是比较克

制的，但是事实上美俄之间恐怕也有一种默契的存在，俄罗斯也知道美国的这次打击是有限性的，因此俄罗斯没有做出非常过激的反应。但是倘使西方如果进一步真正要颠覆巴沙尔政权的时候，那么美俄关系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是值得观察的。

第三，加剧地区乱局和叙利亚危机的长期化。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说过，今年叙利亚问题可能会出现低烈度冲突的再度强化。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西方不会任由叙利亚的局势向着有利于俄罗斯、有利于巴沙尔政权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炸弹扔下去以后，沙特就跳出来近说近期要向叙利亚派出联合部队，无疑是从美国和西方的这种轰炸中得到了鼓舞。伊拉克甚至也要打着剿灭“伊斯兰国”的名义宣布要到叙利亚去作战。这些事态的出现，无疑和西方这次对叙利亚的轰炸有比较大的关系。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的关系来看，西方的军事打击无疑会给濒于失败、四分五裂的反对派注入一支强心剂，进而增加其在政治解决叙利亚谈判过程中的信心和砝码，或坚定其进行负隅顽抗的决心，进而加剧叙利亚危机的长期化。如果从长远的角度看，地区乱局和叙利亚危机的长期化也必将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所利用，为极端组织的发展或者卷土重来提供温床。这已经成为阿富汗战争以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被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形势的发展所证明。阿富汗战争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国际反恐共识在不断地弱化，如果叙利亚和伊拉克再度陷入战乱，那无疑会给极端组织的卷土重来创造机会。

第四，对世界经济及能源市场的冲击总体有限。这方面我是外行，我稍微做点判断。最近几天油价好像还有一

定的上扬，到 70 美元左右。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很难改变 2014 年以来的油价走低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长线的趋势，也就是说不会触发油价大规模的反弹。这里面有这么几点理由。

第一，能源价格对中东动荡反应迟钝已经成为近年来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2014 年的时候正好是“伊斯兰国”兴起，然后阿拉伯世界大乱，但是国际油价恰恰是从 2014 年的中期开始下滑的，到今天仍然看不到强势反弹的势头。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的话，中东的这种局部动荡已经很难带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这是由目前全球能源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第二，主要产油国减产协议效果不佳，伊朗等一些产油国不受限产协议的限制。当然这个限产协议就已经给了伊朗这样一种豁免权，因为伊朗是刚刚签署伊核协议，它刚刚重新回到国际能源市场。再加上现在俄罗斯跟产油国之间的矛盾。尽管有些国家已经进行减产，想通过减产把油价再抬回来，但是现在伊朗和等国家开足了马力在生产。由于我是外行，这些数据我没有去查，但是这些材料我看到过。因此，2014 年以来，尽管俄罗斯和欧佩克组织不断进行多次谈判并签署限产协议，但其内部勾心斗角也很多，使协议的效果不佳。

第三，低油价是美国打击俄罗斯，使俄经济进一步恶化的手段之一。美国乐见低油价，也正是低油价导致严重依赖油气资源的俄罗斯经济陷入一蹶不振，因此长期的低油价有利于美国进一步削弱俄罗斯。

第四，西方经济疲软、页岩油等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新能源革命，改变了供求关系的格局。现在能源

的供应基本上是供过于求，我们所担心的能源危机事实上并不存在。

接下来介绍的第二个方面是外部力量博弈叙利亚的演变。现在有好多事情都变成了谜团。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叙利亚危机最初是从叙利亚南部的德拉，一些孩子在墙上涂鸦一些反对巴沙尔政权的口号，然后家长被抓起来，受到严刑拷打，甚至孩子的母亲遭到侵犯。现在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都充满了争议，有分析认为这个事件都是内外力量勾结导演出来的。由此可见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现在要找到真相真的太难了。要认识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恐怕要对它的整个演变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从外部干预叙利亚危机的角度把它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到 2013 年 8 月化武危机爆发。

在这个阶段，叙利亚一直存在着变成下一个利比亚的态势。这一时期外部力量围绕叙利亚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支持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两派外部力量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外交博弈，以及西方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恫吓。尤其像阿盟、英国和法国不断地在联合国内部推动讨论含有进行政权更迭内容的议案。这是阿盟和英法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对叙利亚进行干涉的时期，也是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外部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那个时候人们一直在判断，哪一天巴沙尔会成为下一个卡扎菲，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国际舆论的判断一直认为巴沙尔会很快倒台。期间有两个时间重要的节点对阿盟和西方外部力量加大对叙危机的干预发挥了重要影响，其一是 2011 年 10 月利比亚战争结束助长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在叙复制利比亚模式的欲望；其二是 2012 年 5 月

胡拉惨案的发生（这个惨案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是谁制造的），促使阿盟和西方以人道主义危机和“保护的责任”为由推动对叙利亚的干涉。这两个事件就不断地促使外部力量推动美国、推动西方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



图 2：“阿拉伯之春”

我们看一下“阿拉伯之春”（图 2），它从突尼斯开始，后来发展到埃及，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变更的，然后就是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西方的干预推翻，他自己也死于非命；还有就是也门的骚乱。当然也门的萨利赫也于去年死于非命。再后来“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到了叙利亚，尽管人们最初判断巴沙尔政权也会很快倒台，但出人意料的是，叙利亚后来变成成了“阿拉伯之春”的防洪堤。当时的伊朗总统还是内贾德，因此西方一厢情愿地希望“阿拉伯之春”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就是在巴沙尔倒掉以后，西方期待的下一个倒掉的就是伊朗。现在伊朗形势仍然有很大的危险，包括去年底今年初，伊朗也发生了民众抗议浪潮。最近伊朗货币贬值是一塌糊涂，再加上特朗普要宣布

解除伊核协议，因此下一步伊朗仍然有乱的可能。但是伊朗自伊斯兰革命近 40 年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还是有一套，但是它现在也确实面临很多问题。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一直存在着叙利亚是不是会被外部军事干预的争论。

第二个阶段就是 2013 年化武危机到 2015 年 9 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2013 年 8 月第一次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到现在也还是悬案。包括 2018 年 4 月份的叙利亚化武危机，究竟是谁制造的无从知道。2013 年化武危机由于触碰了当时奥巴马设定的“一旦出现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会进行干预”的红线。这个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认为叙利亚会滑向战争。但是因为奥巴马当时正在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实在不愿意再因叙利亚问题卷入一场新的战争。因此美国接受了俄罗斯提出的化武换和平的方案。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把化武交出来，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进行处置。这次危机处理方式，事实上使俄罗斯看到美国不会因为叙利亚问题发动另一场类似伊拉克战争那样的战争。

当然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影响叙利亚局势的重要因素，就是 2014 年 6 月“伊斯兰国”的出现。“伊斯兰国”的出现，尤其是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攻城略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准国家实体的形式存在的恐怖主义组织，实际上是泛滥了一年多。2014 年 10 月，虽然美国进行了轰炸，但是效果不显著。直到 2015 年 9 月俄罗斯介入以后，打击“伊斯兰国”这样一个事态才有所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反恐问题就成了影响叙利亚局势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形成了以美国、俄罗斯、沙特主导的三大反恐联盟，当然这三大力量也各自围绕反恐问题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但是“伊斯兰国”的出现，就一定程度上把巴沙尔政权

的去留放到了一边，也就是说打击“伊斯兰国”成为了美俄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 2015 年的 9 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到 2017 年 1 月，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阿斯塔纳机制的建立。应该说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是抓住了战略机遇，军事介入既掌握了打击恐怖组织的这样一种道义和战略的制高点，同时也扭转了叙利亚战局，使得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巴沙尔政权，从 2015 年 9 月以后实际上逐步的缓过来了。这一时期是俄罗斯通过军事介入扭转叙利亚力量对比，进而推动叙利亚问题重回政治解决轨道的重要时期，也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外部力量相对上升、支持反对派的外部力量相对下降的时期。在反恐问题上，俄罗斯这张牌打得非常好。在这期间有很多事件，某种程度上是“以打促谈”，也就是说俄罗斯以反恐为由军事介入叙利亚，又重新把叙利亚危机打回了谈判的轨道。从 2015 年 10 月份以来，尤其是在维也纳、日内瓦开始出现边打边谈的局面。另外就是美俄在反恐问题上共识的增加。以前土耳其跟俄罗斯是对抗的，但是到后来由于土耳其国内政变，由于“居伦运动”的问题，由于难民的问题，由于“伊斯兰国”不断在土耳其制造恐怖袭击的问题，还有美国和土耳其矛盾的不断激化，土耳其又倒向了俄罗斯一边。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就是 2017 年 1 月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建立阿斯塔纳机制以来到现在。2016 年底，经过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酝酿，三方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开辟了一个独立于日内瓦机制之外的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谈判机制。这也是区别于西方主导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日内瓦机制的又一机制，也就出现了这两条机制都在谈的情况。



图 3：阿斯塔纳机制确立的“冲突降级区”分布图

简单说一下，为什么西方现在开始着急？去年 5 月份，在第四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上签署了在叙利亚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备忘录。这一点应该说是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既抓住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又抓住了道义上的主动权的又一做法。叙利亚“冲突降级区”备忘录在伊德利卜、霍姆斯、大马士革分别设定了三个冲突降级区（见图 3），由国际社会和部分像埃及、土耳其这样的地区国家，进行监督停火。冲突降级区的建立，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隔离叙利亚反对派和极端组织的效果，俄罗斯可以更准确地打击一些极端组织。同时也使得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在推动叙利亚问题实现停火方面，发挥了比日内瓦机制更突出的作用。因此 2017 年以来，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方向，在越来越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然后形势就发展到当前的这次叙利亚化武危机，西方实际上是要改变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格局。

接下来是第三个方面，我想分析一下美国、俄罗斯、沙

特、土耳其、以色列等主要域内外力量博弈叙利亚的诉求与政策。

第一个来看美国。我的判断是，美国的叙利亚政策是一种战术性的政策，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政策。为什么这样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战略。除了不断讲巴沙尔必须下台以外，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既是没有一个系统的战略安排，也没有坚定的战略意志。实际上是在亦步亦趋地应对，“伊斯兰国”出来了就不得不做姿态打一打，然后俄罗斯主导权强化了，美国不得不以轰炸叙利亚的方式往回推一下。但是事实上它没有一个清晰的叙利亚问题的战略。也就是说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从始至终呈现出战略犹豫和战略谨慎的特征，其实质是伴随美国实力衰退，美国领导和控制中东的能力严重下降，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使美国抑制住了通过战争对巴沙尔政权进行更迭的战略冲动。

奥巴马上台以来，做的主要的任务是要撤军，是要从阿富汗撤军、从伊拉克撤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实力衰退、又想从中东撤出来的时候，然后中东发生了大变，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到叙利亚相继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想从中东出来的时候，然后中东变得更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美国人对奥巴马批评非常多，认为他的中东政策软弱、失败。但是我觉得奥巴马的选择是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包括我们中国的战略学界，现在仍然在一厢情愿地希望美国陷在中东，认为中东有可能给中国再次创造战略机遇。但这可能性已经非常小，实际上无论是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很聪明，都不是当年的小布什。

现在尽管特朗普在中东个别问题上动作动静很大，但是他没有一个成熟的战略，在叙利亚问题上体现的更是如此。

我们来看特朗普上台一年以来他做的这些事情，包括颁布“限穆令”，遏制伊朗并挑拨沙特与伊朗对抗、打击“伊斯兰国”、修补盟友关系并推销军火谋利、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等，这些都很引起舆论的注意，但是这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个内在的逻辑。美国究竟要在中东干什么？当年小布什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把这些反美政权铲除掉，然后搞“大中东民主计划”。但是特朗普究竟要在中东干什么？虽然在内在逻辑上不清楚，但是能看得清楚的是他做的这一系列事情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利益。比如说特朗普访问沙特，挑拨沙特跟伊朗的关系，然后一下子卖给沙特 1100 亿美元的军火（如果算总账的话，是 3000 多亿美元的军火）。现在美国在中东已经不再讲信誉，不再讲道理，甚至特朗普认为“民主推销”都不要搞了。因此唯一能看的清楚的是美国要在中东卖军火捞钱。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认为美国现在在好多地区实行可抑制的冲突管理战略，就是让冲突可以控制。然后在此过程中美国可以操控，另外可以大卖军火。这次打完了，特朗普说“结果很棒，任务完成”，也就是说看不到特朗普很快发动另一次行动的可能性。这是对美国政策本质的一个认识。当然特朗普的战略给世界带来的困难就是难以判断，他没有一个自洽的逻辑和体系。但是当他把一套拳打完了的话，又能够找到一个逻辑，这是他的狡猾之处。也就是说他在出一张张牌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些牌的内在的联系，但是当他打完了这一系列的牌以后，大家可能能看出点线索来。

第二，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应该

是一种战略性的安排。显然叙利亚对于俄罗斯的战略重要性，相对于叙利亚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俄罗斯从最初就呈现出从战略局部到战略全局的拓展、从战略游移到战略坚定的强化过程。俄罗斯把叙利亚看成是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摆脱其地缘政治困境的战略支点，也把叙利亚作为当前俄罗斯国际战略的支点来运筹。无论是从维护他的塔尔图斯港军事基地的安全，还有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从高加索地区向俄罗斯南部渗透，这些都是俄罗斯切切实实的利益。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安排，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2015 年 9 月军事介入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在地中海的权力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唯一的一个军事基地。

在叙利亚问题的运筹上，俄罗斯不但是通过打击“伊斯兰国”，改变叙利亚问题的力量对比态势，同时也不断扩大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土耳其、埃及，也被他拉了过来。去年沙特国王萨勒曼也访问俄罗斯，也就是说美国这些盟友跟他也保持着关系不断密切的态势。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打的是一套组合拳，既有现实的利益，同时又有一个地缘战略安排的考虑，还有分化美国盟友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安排，当然俄罗斯的困难是国内的经济。这次叙利亚化武危机给俄罗斯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俄罗斯等于是咽下了这口气。未来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究竟有没有颠覆性的政策改变，这一点是俄罗斯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第三，我们说一下叙利亚的北部邻国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从最初要推倒巴沙尔政权，到后来倒向俄罗斯，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在这里面的变化是最戏剧性的。现在他颠覆巴

沙尔政权的目标还没有改变，但是起码是把问题放一边了。他现在最关切的是库尔德问题。中东变局尤其是打击“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内战，使得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力量不断壮大。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去年搞了公投（因遭到各方反对未能独立），但现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自治已经成为事实。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 2016 年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这基本上是一个分水岭。“居伦运动”对土耳其政府的挑战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政策的改变。也就是说从 2016 年 7 月的土耳其未遂政变发生以后，他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促使他进行政策改变。

土耳其介入“阿拉伯”之春最初的动因是其加入欧盟受挫。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土耳其对入盟问题非常窝火，他按照欧盟的相关规范要求做了一系列改变，国内的人权问题也好，法律问题也好，都迎合欧盟，但就是加入不了欧盟。因此，中东变局出现以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认为重返中东的机会来了，所以开始重返中东，推波助澜地支持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的反对派，甚至土耳其还想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打造成类似正义与发展党的一个样板。实际上这个正义与发展党是穆兄会的徒弟，但是在土耳其执政了，然后成为一个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土耳其在支持穆斯林兄弟会问题上那么起劲，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这种模式在中东地区推广，影响这些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是把正义与发展党所创立的这种所谓的温和伊斯兰民主，变成“阿拉伯之春”以后向中东国家尤其像埃及这些国家推销的一种样板。但是到了后来就不断出现问题，国内的未遂政变，还有由于 2015 年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伊斯兰国”出现以后，

难民的问题，国内的安全问题，再加上这个“居伦运动”的问题（据说俄罗斯在“居伦运动”问题上给他提供了不少的情报），使得土耳其政策发生改变。这个改变过程我就不再给大家详细讲了。



图 4：库尔德人控制地区分布图

现在叙利亚的情况就是谁都能到叙利亚这个鱼塘里边去钓钓鱼，谁都能到这个叙利亚的这盘棋上去走两步，也就是说几乎各种地区力量都介入了。值得引人注目的一点，今年的1月份到3月份，土耳其进入到叙利亚的阿夫林地区（见图4），就是这个图中右上方的那个角，东边的这些黄色的地方，还有阿夫林地区也是黄色的，这都已经被在叙利亚内战和打击“伊斯兰国”斗争中崛起的库尔德人控制。他们现在罗贾瓦已经建立了政权，采用的是左翼的思想，那里现在正在轰轰烈烈地搞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左翼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西边有个角就是阿夫林地区，这个地区也是库尔德人控制的，只有中间有一个间断是被叙利亚反对派所控制。阿夫林地区正好是在土耳其的边境上，土耳其就

想进入阿夫林，然后继续向东打，他的理想目标是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区打出一个 30 公里纵深的缓冲地带。打出这个缓冲地带以后，再把滞留在土耳其的阿拉伯难民，移民到库尔德地区去，那么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也就是说让阿拉伯人到那里去牵制库尔德人，进而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之间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

所以说我们可以观察今年或明年的什么时候，土耳其说不定还要打。埃尔多安已经说了这还没有结束，他要打通叙利亚的北部边境。2015 年曾经打过一次，叫“幼发拉底河行动”。今年 3 月份打的这次美国俄罗斯都不管，都默认。特朗普现在经常是放一个烟雾弹，然后就出来一些事情。特朗普宣布要在库区建立一个以叙利亚民主军（也就是库尔德人的部队）为主导的 3 万人的安全部队，土耳其就以这个为理由发动了对阿夫林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未来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觑。因为现在库尔德人也是个倒霉蛋，“阿拉伯之春”给他带来了发展空间，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自治在增强，去年还闹独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也在自治，但是当他们谋求再往前发展，或者说谋求独立的时候，美国佬跟北极熊都不管的。因此有位库尔德的评论家说：“库尔德人只有高山，没有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库尔德人的命运就是不断被出卖、不断被进行利益交换。但是库尔德人问题下一步还会是影响叙利亚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看沙特，沙特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为什么这么起劲。到目前为止，沙特依然没有改变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標。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两个：

一方面，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来说，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现在已经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后一个堡垒。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纳赛尔时期，是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辉煌时期，后来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都奉行复兴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现在衰落了，然后复兴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萨达姆政权已经被美国干掉了，现在的叙利亚就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唯一剩下的果实。长期以来，泛伊斯兰主义跟泛阿拉伯主义是死对头，当年埃及跟沙特的矛盾就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跟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争夺。因此沙特是想借“阿拉伯之春”，把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彻底毁掉，把巴沙尔政权这样一个最后的堡垒毁掉。



图 5：中东什叶派穆斯林分布图

另一方面是从教派矛盾的角度来考虑，就是沙特跟伊朗

之间的地缘政治的争夺。图 5 是中东什叶派穆斯林分布图，那个起点是伊朗，然后经过伊拉克，经过黎巴嫩真主党，到叙利亚这样一个“新月地带”。这是沙特的一个判断，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的影响在不断增强，然后在叙利亚危机中支持的阿萨德政权又是一个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因此在沙特看来，伊朗正在打一个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的什叶派走廊，也被称之为“什叶派新月地带”。沙特跟伊朗是今天中东地缘政治争夺里面一对死对头，既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又有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的矛盾，同时还有争夺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所以沙特的想法是叙利亚一倒，那么下一步倒的就是伊朗。现在沙特还支持了叙利亚反对派的好多力量，有些反对派是直接听命于沙特。举一个例子，在 2017 年 12 月的第八轮日内瓦和谈中，在反对派“叙利亚谈判委员会”中，据说受到沙特支持、态度强硬的利雅得派在 36 人的代表团中占据 28 席，他们的“倒巴沙尔”立场令叙政府代表团推迟参会，甚至一度返回大马士革。

图 6 体现的更明确一点，从波斯湾的巴林到幼发拉底平原的伊拉克，到黎巴嫩，再到叙利亚，现在这几个点都是沙特和伊朗的竞争点，也都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的焦点。当然沙特现在也面临很多问题。大家可能知道，昨天沙特就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情，沙特王宫上面出现了一个无人机（据说就是玩具无人机），然后被沙特安全部队打下来。在历史上，沙特王宫曾经上演侄子杀伯伯这种宫廷血案。现在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搞反腐，然后抓了很多王室。据说沙特通过反腐就能获得上千亿美元，但也导致王室内部的关系紧张。现在沙特又在也门打仗，打那个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的胡塞武

装，已经打了三年多。而且现在又面临着内部的改革，长期的低油价，沙特的“土豪”也开始捉襟见肘，因此下一步他面临的困难也是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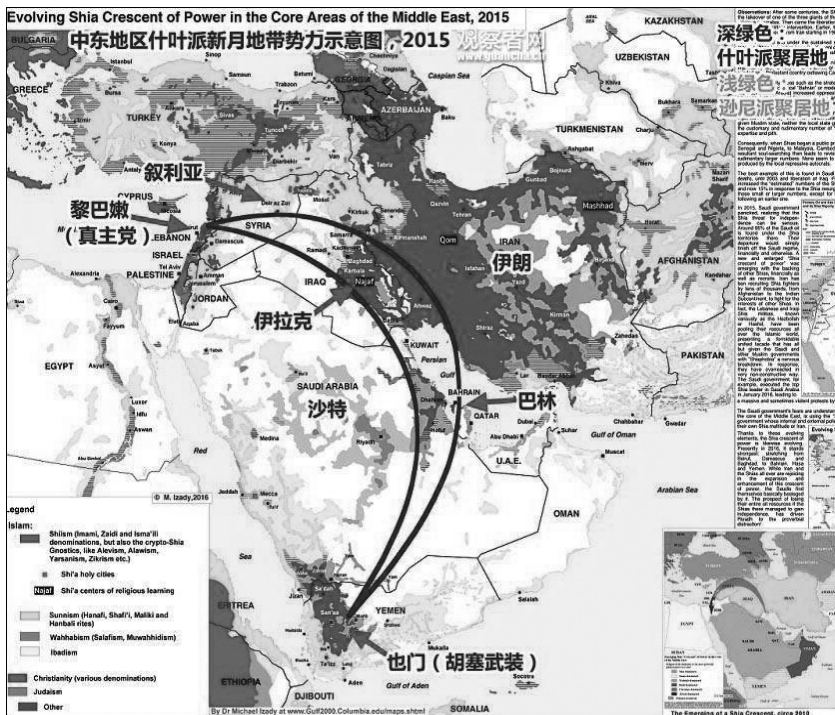


图 6：中东地区什叶派新月地带势力示意图，2015

大家看一下图 7，绿色的地方就是什叶派，深灰色的地方就是逊尼派，我们看沙特跟伊朗各自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中心，然后沙特阿拉伯半岛东部边缘也有一片绿色，代表 10%-15% 的人口是什叶派，然后那个地区又恰好是沙特石油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说来话长，有很多问题可以分析。现在双方的矛盾有教派的因素，但是本质上并不是教派矛盾，还是政治权力的矛盾，教派矛盾只不

过是一个载体。在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沙特跟伊朗相安无事，而且沙特和伊朗当时都是美国的盟友，那个时候教派也是存在的。所以说更多的是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教派矛盾充当权力斗争的载体。

Lines in the Sand: Shiites as % of Muslim Popu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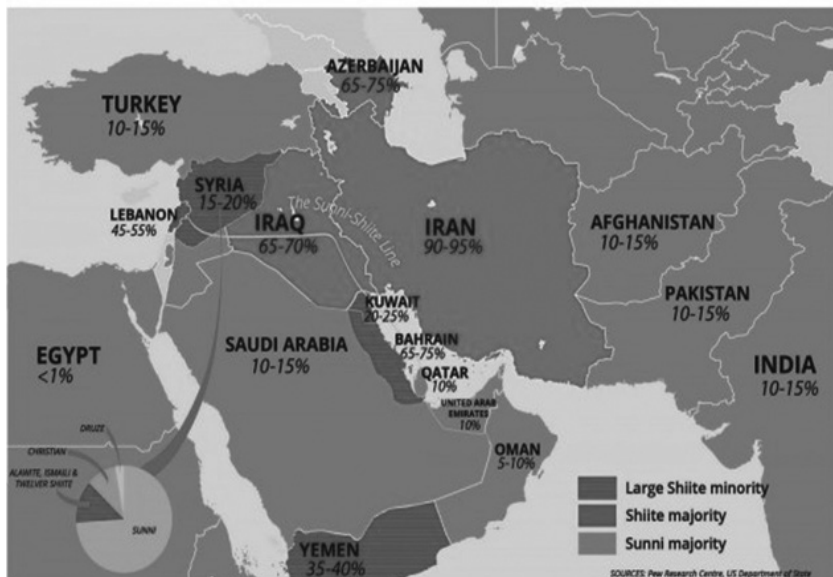


图 7：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的百分比分布图

现在我们跟中东人开国际会议，就怕同一个桌子上有沙特和伊朗人，那这个会议就不会消停了，两者几乎是不停死掐，基本上已经成了一种极端化的现象。在国际会议上，只要有以色列和伊朗，或者沙特和伊朗，都会出现争执不下、相互攻击的局面。如果从宗教矛盾来说的话，沙特跟以色列的矛盾应该更大。我觉得现在沙特在于在伊斯兰世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现在跟以色列走的很近，明里暗里搞很多的合作。

再看伊朗，伊朗与巴沙尔政权实际上就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刚才说“阿拉伯之春”，当时西方的希望就是如果搞定叙利亚的话，那么下一步就是冲击伊朗。因此伊朗对巴沙尔政权的支持，既有维护伊朗现实利益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什叶派与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此外伊朗也通过叙利亚问题增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控制。现在在叙利亚的战场上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现在以色列为什么对真主党特别忌惮？因为真主党既有战斗力，然后反以色列的意志又非常坚定。总之，伊朗有维护自身安全和抗衡沙特、美国的种种需要，因此伊朗成为地区层面巴沙尔政权最铁的支持者。

这里稍微讲一下伊朗与叙利亚的关系。人们经常说两者的结合就是由于教派，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实际上伊朗是一个神权政权，巴沙尔是一个世俗的政权，尽管教派相同，但巴沙尔的意识形态是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因此二者的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派结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双方的关系还曾经一度是比较恶化的。到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再加上埃及跟以色列开始签署和平条约以后，共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才使伊朗跟叙利亚的合作开始加强。

巴沙尔政权所在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一个很小的分支，甚至什叶派过去都不承认他。伊朗是什叶派世界的中心，当年是伊朗宗教人士帮老阿萨德“验明正身”之后，什叶派才承认巴沙尔政权所在的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这才使巴沙尔家族有了什叶派的合法性。因为阿拉维派据说是混合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不同宗教的教义，它不是纯正意义上的伊斯兰教。因此，在教派属性问题上，伊朗对叙利亚“有

恩”，叙利亚也自然是“有恩必报”。当年两伊战争的时候，叙利亚没有支持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而是选择支持了属于波斯民族的伊朗，因此那个时候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到了海湾战争以后，双方关系一度又出现疏远。直到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后，当时舆论上存在着美国下一步会不会打叙利亚的争论。因此伊朗知道如果当时美国收拾叙利亚，下一步就是伊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盟友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因此伊朗跟叙利亚的这个同盟本质上并不是教派同盟，而是一个利益同盟。当然教派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媒介作用，这是我对于双方关系的看法。

最后再谈谈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目前以色列担心的是他的死对头伊朗的力量离自己越来越近。在这次美国打击叙利亚之前，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遭到了不明导弹的袭击，十有八九就是以色列干的。“阿拉伯之春”以来，以色列是闷声发大财。因为阿拉伯国家越乱，越无法集体来对付他，因此他基本上非常低调。但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做法是只要掌握真主党或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准确的情报，一露头就打。这几年已经打了好几次，据说打得都很准，打得主要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

2016 年以来，以色列的小动作越来越频繁。随着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在叙利亚力量的不断增强，恐怕以色列还会下手，以色列在暗杀事件和精确打击上是相当有一套的。据说今天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的一个人被干掉了。从逻辑上来说，以色列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以色列主要关心的是安全。

最后谈一下我对叙利亚危机发展趋势的认识。我的总体

的判断是“大打不会有，小打不会断”。它不会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样的战争，但是也不会消停。当然这个态势维持到什么时候很难知道，基本上仍然维持在一个“大打不会有，小打不会断”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围绕叙问题的战略博弈进入混沌期，突出表现在美俄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态势。有俄罗斯专家称其为“混合冷战”，双方对叙政权问题分歧严重，但在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反恐问题上又保持合作。俄罗斯可能相对容易判断一点，而美国下一步究竟打什么牌很难预料。特朗普给战略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出的最大难题就是，想理清他的逻辑非常困难。看的比较清楚的是，特朗普尽管不断地骂奥巴马，但是他在叙利亚执行的是没有奥巴马的奥巴马主义。也就说他在叙利亚仍然是不想陷入战争的，这一点跟奥巴马没有区别，就是说美俄的博弈会进入一个相对更复杂的时期。

第二，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斗争进入了复杂相持期，政治解决成为主要方向，但围绕巴沙尔政权去留和恐怖组织界定等问题的分歧严重。最有可能的是继续循环现在这样一种悲剧性的局面，一旦和谈的局面向好的方向发展，美国就会搞出某种事情把事态再拉回去，然后陷入这样一种“不大打，但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局面。那样的话最倒霉的是叙利亚，也就是说叙利亚会继续充当大国博弈和地区力量博弈的棋盘。俄罗斯能不能保巴沙尔政权到底？如果俄罗斯的利益得到美国相应的安排的话，是否会发生改变也值得关注。实际上俄罗斯并没有“一直要保巴沙尔政权到底”的承诺。

第三，围绕叙利亚问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支持叙政府力量的方向发展，但两个阵营都在总体上都呈内部

分化复杂化的态势。

第四，直接的军事较量有所下降，但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低烈度冲突将长期化，如近期无人机对俄军事基地的轰炸，以色列对叙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对阿夫林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动的军事打击，西方近期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等。

第五，国内因素对各大外部力量的叙利亚政策的掣肘加大，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等都是如此。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叙利亚危机或将进入政治解决艰难和低烈度冲突并存的僵持期。

现在来看的话，实际上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都各有各的问题。无论是内部的困境，还是外交和地区上的问题，每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因此现在的叙利亚就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我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以化武危机为切入点，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叙利亚问题各方的博弈。由于叙利亚问题太复杂，很多问题我也不一定讲的很清楚，可能也不一定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乔依德：刚才刘教授非常有条理的，把最近叙利亚化武危机的问题给大家梳理了一遍，特别是对中东的乱局做了分析，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进行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左学金：谢谢刘教授讲解叙利亚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人，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评论、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化武袭击是叙利亚政府所为，有的人说是英国制造的，你能不能从学者的角度稍微做一点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说到俄罗斯由于国际能源价格问题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俄罗斯国内也有很大的问题，经济比较低迷，因

为俄罗斯现在 GDP 在全球占的比重下降了 1.5% 左右。那么从长期来看，对今后俄罗斯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参与全球博弈的能力会有什么样的预测？谢谢。

刘中民：我之所以在讲座前说了古罗马皇帝的那句话，也是留给你们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这个分析化武危机的真相，只能从逻辑上来分析，也就是说按照现在事态的发展，巴沙尔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在逻辑上说不通。就事件真相的判断而言，包括联合国以及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来裁定这个事情都非常困难。但我仍然相信巴沙尔政权在这个时候使用化学武器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具体细节，那是一个学者所没法判断的。

但是这几年事情的演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一旦叙利亚局势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化学武器事件就会出现，而且都会把脏水泼到巴沙尔政权身上。我基本上是这么理解的，从逻辑上来说，很可能是西方及其支持的反对派组织共同导演，也不排除是某些极端组织从中挑拨，通过这样一种事件来扩大事态、制造矛盾，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说到俄罗斯，我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现在俄罗斯在全球战略的博弈上还有两大资本，其中一大资本就是他的军事力量，从军事力量单项上来说，除了美国就是俄罗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俄罗斯的这种水平。另一大资本就是俄罗斯的战略意志，俄罗斯的民族性，再加上普京个人的战略决断意志，还有普京对机遇的把握，对整个那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的把握，这都是普京的强项。

乔依德：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沙龙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刘教授的演讲，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